

* 專題演講 *

日本幕末以來的文化攘夷論

連清吉*

一、攘夷論的形成

十九世紀後半產業革命成功的美國，爲了和中國進行貿易，尋求停泊港而企求與日本建立邦交。弘化三年（1846）派遣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官 Biddle 到日本交涉，遭到幕府的拒絕。嘉永六年（1853）東印度艦隊司令官 Pery 帶領軍艦四艘停泊浦賀，提出總統的國書要求開關建交。幕府屈服於其軍事壓力，不得已接受國書，請求 Pery 退去。翌年的安政元年（1854）再度叩關，強烈地要求締結友好條約。幕府在沒有對策的情況下，答應其要求，締結日美和親條約（又稱爲神奈川條約）：(1) 供給美國船隻的燃料和食料；(2) 開放下田、箱館二港，承認領事駐在；(3) 美國享受最惠國待遇。其後英國、俄羅斯也要求和日本締結同樣的條約。二百年的鎖國政策終於瓦解。安政五年（1858）改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1) 開放神奈川、長崎、新潟、兵庫等港口；(2) 設定開放港口的居留地，禁止一般外國人到日本國內的其他地方旅行；(3) 自由通商貿易；(4) 日本的關稅由雙方協定；(5) 承認領事裁判權。日本完全喪失其自主權，因此，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相當於不平等條約。其後荷蘭、法國、英國、俄羅斯也要求締結同樣的條約。

日本與外國的貿易，主要是輸入武器、艦船和毛棉織物而輸出生絲和茶。由於大量輸出的結果，輸出品生產力固然提高，相對地便宜的棉織物也大量輸入，對棉作和棉織物業產生極大的壓力。又由於日本和外國的金價差距懸殊，一時金貨往外國流出。伴隨著輸出的激增，帶來了國內消費物質的短缺，幣制的混亂，造成都

* 作者係日本鹿兒島純心女子大學國際言語文化學部助教授。本文爲民國 84 年 9 月 22 日在本處發表的專題演講。

市物價高昂，庶民的生活受到極大的壓迫。因此，日本國內對貿易產生極大的反感。再加上與外國人發生衝突，終於引發攘夷運動。但是在日本國內，以長州藩下級藩士為首的攘夷論和以薩摩藩為首的公武合體論產生政治鬥爭。英國、荷蘭、美國、法國四國連合艦隊攻擊下關，大敗長州藩的軍隊。在此情況下，攘夷論便不能長久維持下去。再者，在幕府頹廢，封建制度批判論，公武合體論而延伸的革新論的高聲提倡下，薩摩藩和長州藩的革新派的連合，即所謂薩長連合的討幕倒幕軍事行動下，慶應三年（1867）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上表大政奉還，結束二百六十多年的幕府統治，還政於天皇。

二、幕末知識階層的時代感受

在合理主義高張，對既成傳統的儒教權威產生疑問聲中，幕末知識階層所反省的問題有二：一為長久以來，江戶幕府所存在的政教分離的問題；一為西洋文明東漸以後，東方社會果真能接受西方文化而全盤西化。

德川幕府是以武士階級為主的封建體制，知識階層的地位與俸祿並不高。即使幕府將軍立朱子學為官學，其於儒學的接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江戶時代畢竟是以武士統治為主導的社會，並且沒有科舉制度，知識分子欲以學問而取得高官厚祿的可能性甚低。因此，自始即形成政教分離的現象。學問的研究，乃有純粹學術化的傾向。再加上寬政年間頒行「異學禁令」，不但官學與私學的分途明顯化，而且更形成學不問政的學術純化的風氣。

幕末漢學家鹽谷宕陰（1809-1867）於安政四年（1858）撰述《六藝論》，反省政教分離與學術純化的偏頗，提出政教合一、實學主義等主張。

要約《六藝論》的要旨，可歸納為以下四個要點：

- (1)所謂「六藝」，即以爲學問乃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實學；而不是易書詩禮樂春秋的經典之學。
- (2)學問本來是文武一體、政教合一的。
- (3)西洋的學校制度是大中小學體系化的，且教師的生活安定，學生的人數適當，教育成果可以預期，故值得採行。
- (4)德行的實踐，固然在於止於至善；但是其遂行的責成，則必須以六藝的習得為基礎。

《六藝論》是鹽谷宕陰於安政四年，即明治維新前十年的幕府末期所提出的。其所指陳的，自然與當時的政治社會諸事象有密切的關聯。亦即其對於時代背景是有所對應的。例如對應於外來的「西洋衝擊」，《六藝論》是一種怪世論；針對國內學者執著於心性論，或埋首於訓估考證的研究方法，《六藝論》是學術風尚的批判論。除此之外，鹽谷宕陰所提出六藝觀，即其學問論的論述，也頗有見解。

第一，主張六藝是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技藝為中心的學問；而不是以易為中心的經典主義的學問。

第二，主張「道寓於器」，以展開個別學科研究之道。西洋學術的道德性雖然微薄，但是醫學、法律、教育等學科，乃至於射御書數及後起的科學技術之學，皆為實用之學。宜予肯定並加以倡行。

第三，學問若以六藝實用之學為宗旨，則儒家思想教育所重視的基礎教養之學，乃得以具體地落實。

鹽谷宕陰感受到學政的積弊陳痼，有亟於振興的必要，進而提出改革之道。換而言之，乃著眼於內政與學術的更革。然則，幕末的強烈震撼，在於西洋文明的東漸，導致鎖國政策的傾頹，幕府政體的瓦解。自幕末「黑船」叩關以來，日本舉國上下皆震驚於西洋的船堅砲利，西方的科技文明的新穎。隨著幕府解體、西洋文明崇尚的風起雲湧，東洋傳統文化與思想，被認為是落後的象徵，甚且有不合時宜，應全盤捨棄的主張。傳統文化面臨消弭無形的危機，學界老成未嘗沒有維繫固有文化傳承的呼聲。堅持保存東洋文化以力挽狂瀾的是，與鹽谷宕陰同為昌平黌教授的安井息軒（1799-1876）。

安井息軒以為東方經典所描繪的理想世界及其呈現的社會，是井然不紊的階級社會，而非萬有平等的。再者，社會的主宰是才德兼備的士大夫。換句話說，息軒秉持儒家精神，主張人間世界是以人為主的，而不是神權支配的。故本著儒生的真執與力挽狂瀾的文化使命感，於明治六年（1873），七十五歲時著《辨妄》一書，強調儒家思想的合理主義，傾全力展開對基督教的批判。而貫通全篇的主旨是，以科學實證的合理主義批判聖經故事的荒誕不經。如《聖經》所載「夏娃為蛇所誘，食其所禁之果，乃罰婦女以胎孕之苦，重加之以產子之難」（《辨妄》一）的原罪論，息軒說：

夏娃食所禁之果不為無罪，罰之亦可。以夏娃之罪，並罰後世之婦女，使之

產子是艱，何其冤也。凡有血氣者，皆有雌雄牝牡，各相配以蕃其類。彼亦犯何罪，使其雌與牝受胎孕之苦也。(同上)

即批判基督教原罪論之荒謬太甚。天地萬物之雌雄牝牡的結合，乃自然之事，又何罪之有。至於所謂雌牝受胎生子之苦，乃肇因於夏娃食禁果所惹禍，因而殃及後世婦女，則大有逕庭。其次，對於耶和華破天淵而淹沒生物的記載，息軒痛斥曰：

甚哉，耶和華之暴也。雖世人罪惡貫盈，未必盡為桀驁，其中必有差善者焉。今不導立以下道，又不分其罪之輕重大小，出其不意，卒然破天淵之隙，盡淹殺之，並禽獸。獨愛諾亞，使之預造舟以免其災。用心如此，安在其為天地主宰哉。(同上)

由於世人的惡類罪行滿盈而欲誅殺殆盡，不但不符合宗教淑世博愛的精神，而且偏狹太甚。故息軒以為基督教不具生養萬物的宗教情懷。

安井息軒之所以批判聖經故事，蓋源自於幕末維新以來，崇洋風氣盛行；但是西方文明之根源所在的聖經，卻是荒誕不經的，不但無淑世的精神，而且具有偏狹適排他性。由此記載所發展出來的西方文明，又如何值得頌揚宣傳。浸染於基督教教義研究的山路愛山推崇息軒的《辨妄》，說：

此書是耶穌教傳入日本時，首先提出非難之著作。亦為以日本傳統思想批判新信仰之最聰明者也。〔……〕固為非常之傑作。

即指出安井息軒抱持著老儒生的執著，堅信東洋文化的優越性。亦即東方世界自有既成的社會結構與思想傳承；即使西洋文明有其特性，卻未必可以不加思索地移植至東方社會，進而全盤西化。否則，不但中西不能合璧，東方的優良傳統文化也將淪喪殆盡。^①

但是，安井息軒的執著卻在崇尚西洋的時代潮流中，只是一股極為微弱的維護

^① 關於安井息軒的事跡，參見町田三郎先生的〈安井息軒覺書〉，《東方學》，第72輯。

傳統的呼聲，隨著明治文明開化的高揚，也為人所遺忘。再度呼喚重視儒家傳統的學者是岡本監輔。

岡本監輔，幼名文平，號韋庵。德川幕府傾覆前的天保十年（1839），生於四國德島的農村。前半生狂熱於庫頁島、樺太的探險，維新後的後半生則以儒學者、教育者而知聞一時。明治三十七年（1904）死於東京，享年六十六。

明治十年代初期，岡本監輔批判不經思索而一味地追求歐化的時勢，主張重振以孔孟思想為支柱的社會秩序。此一主張與日後旨在儒學復興之「斯文會」的設立，有密切的關連。

最初，岡本監輔與森重遠等人以復興和漢學為由而發起「思齊會」。然不敵時代的潮流而難以實行。適值當時的右大臣岩倉具視亦頗憂慮極端的歐化主義可能造成不良的後果，以為儒道的振興有其社會的必要性。風聞「思齊會」之事，極力支持。於是糾合群賢，「思齊會」在重野安繹、川田剛等斯文宿儒的籌畫下，會名改為「斯文會」，重新招收會員。結果引起極大的回響，立時有一千五百人入會。

《岡本子》五卷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七月由哲學書院刊行。是搜集岡本監輔在斯文會的講義，或預定講授的教材而成的。全部用漢文撰寫。目次如下：

- 第一卷 儀範第一 藝業第二 學統第三
- 第二卷 力行第四 體仁第五 一貫第六 萬物第七
- 第三卷 論心第八 論性第九 天說第十
- 第四卷 道器第十一 陰陽第十二 鬼神第十三
- 第五卷 政法第十四 君道第十五

顯而易見地，直接與政治社會有關係的論說是第一、五卷。而大部分則是心性論、天論等，與倫理道德有關的論述。此乃是《岡本子》的主旨，也是岡本監輔的關心所在。

明治二十年（1887）前後，「塵鳴館」成立洋式舞踏會，象徵著日本心醉於歐美文化模倣的全盛期。當然以為媚於歐化風潮者，是沒有見識的人也為數不少。但好不容易認知和漢學有實現的必要性，且設立的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卻僅有二屆的畢業生，於明治二十一年就廢止了。由此可知，畢竟一般社會還是盛行「事洋學而不喜和漢學，嘲笑漢學者為愚者」的風潮。

在此社會狀況中，岡本監輔挺身於「斯文會」的設立，收集哲學館的講義時刊行《儒學》一冊，且於明治二十二年出版《岡本子》一書。換而言之，岡本監輔在

舉世風行歐化之時，強調東洋思想與儒學的重要性，而提出自己的主張，企圖力挽狂瀾。其主張固然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至於一般大眾都贊同，卻也未必。

《岡本子》的思想要旨，在於以氣一元論為根本而架構的宇宙論和對應於此一宇宙論而提出的「誠」的哲學。進而以此主張呼喚沈迷於歐化主義的世道人心，能有恢復道義的覺醒。雖然岡本監輔所論說的，未必是新說，但是，其力挽狂瀾的意志，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因此，由《岡本子》一書的內容，可以深刻地體認到岡本監輔咀嚼儒家思想，提倡東洋道德論的用心。綜括《岡本子》全書的論述，則在強調當今的急務是恢復道義與道德心。

岡本監輔之所以提出如此的主張，乃抱持著當代中國學學者，即儒者承擔時代責任的自覺。面對當今的情勢，而反省自身從來所理解的東洋的學問究竟是什麼，時潮所尚的歐美文化的本質是什麼，又如何對應來勢洶洶的西洋文明等問題。岡本監輔反省的結果，如芳賀矢一於《岡本子·跋文》所敘述的，「(岡本監輔)發憤讀泰西之書」而論著《岡本子》一書，以提出其思想主旨。綜觀《岡本子》的內容，果真是抱持著儒家「任重道遠」的精神，毅然決然地以全副的心力面對歐美文化。芳賀矢一推崇岡本監輔，說「雖然今之學者，相胥流於浮華者也，其讀岡本子，以為迂闊者必多矣」。但蘇格拉底之說道德，雖為當時人所譏笑，而千年之後，其論說卻成為定論。因此「焉知今日之笑岡本子者，亦莫非當時之笑蘇氏者哉」。

先於岡本監輔，在明治六年（1873），晚年的安井息軒以為蜂擁而來的歐美文化的本質是基督教，乃以其窮年研究聖經，指出聖經矛盾與虛妄的所在，進而以宿儒的立場尖銳地批判基督教的教義，撰述《辨妄》一書。山路愛山指出：「就當時的知識水準而言，《辨妄》一書是非凡的傑作。」但是，當時崇信基督教為文明支柱的青年人卻以為《辨妄》的主張，「無非是無用之觀」。^②執著於以儒家精神維持東洋社會秩序的老儒者的呼喚，終被時代的洪流所吞沒。

《岡本子》的命運大抵和安井息軒的《辨妄》相同，雖然受到一部分人的贊同，卻終究消失於時代的潮流中，而為後人所遺忘。但是，在歐化萬能的時流中，以形而上與形而下兩方面細說對抗於西洋的東洋立場及其本質的《岡本子》，時至今日，誠有重新評價的必要。畢竟岡本監輔通過《岡本子》一書，提出修正歐化一邊倒的偏向，進而高唱東洋精神。即使被譏笑為陳腔爛調，不合時宜的儒家本位主義與東

^② 見山路愛山：《現代日本教會史論》，頁 30-43。

洋精神尊重的主張，由於安井息軒、岡本監輔等人大聲高呼的結果，逐漸喚醒後人的心志，理解並重視植根於傳統的正統文化。就此意義而言，《岡本子》是敘說明治時代之學術思潮極為重要的資料。

三、古典講習科

明治十年（1877），東京大學創立。於文學部第二科設置和漢文學科。但是當時英文學是大學必修科目，大學的所有科目都以英語教學。總理法文理三學部的加藤弘之鑑於漢學的大老凋謝殆盡，應培養後繼者，以保護並維持日本傳統學問。再者無論研究歷史或政治學，都必須要有和漢古典、歷史、文學等基礎知識為理由，在明治十二年，向文部省申請於東京大學設立「古典講習科」。但是文部省沒有答應。十四年再度提出，十五年五月，同意文學部設立以「國學」為主的「古典講習科」。同年十一月，文部省專門局長濱尾新提出設立漢文學講習科的必要。於是以「國學」為主的「古典講習科」稱為「古典講習科」甲部，以「漢文學」為主的稱為「支那古典講習科」屬於「古典講習科」乙部。修業年限為四年。招收四十名學生。

在大學經費困難，而且受到一般社會流行尊重「洋學」風氣的影響，明治十八年停止招收古典講習科的學生，明治二十年，將古典講習科的修業年限縮短了一年。明治二十一年，廢止。畢業生共四十四名。

明治天皇於十九年視察東京大學，由元田元孚整理而頒布了〈聖諭記〉。其中期待古典講習科能培養出通曉「治要之道」，能經世濟民的人材。雖然，古典講習科的畢業生未必能為世所用，但是由明治後半到昭和初年，代表日本東洋學的俊才輩出，古典講習科是有其承先啓後的地位。因為第一，「古典講習科」所講授的不是「左國史漢」和漢詩習作，而是以《皇清經解》為中心的純粹的實證的學問。換句話說，「古典講習科」所傳授的是與政治道德分離的純學問意識。近代的「漢學」研究可以說是由「古典講習科」開始的。第二，由於漢學研究領域的擴大而有嶄新研究分野的創立。這也是「古典講習科」的成果。如林泰輔的中國古代史和甲骨文的研究，長尾雨山的中國藝術論，都是新分野的開拓。至於「日本漢學史」的研究，如安井小太郎的「本邦儒漢學史」，則是受到西洋學術研究的影響而新產生的一門學問。第三，「古典講習科」的畢業生雖然只有四十四名，但是能繼承江戶時代的學問研究，又活躍於當時的日本漢學界，在日本一流大學教授生徒，建立了近代中國學研究的

基盤，確立了承先啓後的地位。^③

四、《棧雲峽雨日記》與《觀光記游》

明治初期，二位日本人到中國旅行，各以漢文記述其見聞。其一為竹添光鴻於明治九年（1876）記載其遊覽中國西北、西南部而成的《棧雲峽雨日記》；其一為岡鹿門於明治十七年（1884）以記錄上海為中心之東南遊歷而成的《觀光記游》。

竹添光鴻的《棧雲峽雨日記》以山水、風土，即自然描寫為中心。岡鹿門的《觀光記游》則著重於人物、政治、時事的記述。在《棧雲峽雨日記》中，隨處可以看到近代日本人首次旅遊中國，對中國風物極為感動的敘述。但是岡鹿門的中國紀行則傾向於對當時中國政治、社會的批判。何以二人皆受到漢學的薰陶，然則二遊記前後相距八年，對於中國的觀點卻大相逕庭。探究其原因，大抵有二：

第一，二人的年齡、性格與立場有差異。旅行中國時，竹添光鴻是三十五歲，岡鹿門是五十歲。竹添光鴻洋溢著而立之年的熱情，岡鹿門則顯示出沈穩歷練的老成。竹添光鴻當時是一國的外交官，自然不容許任意發言。岡鹿門是在野的文人，即使作政治評論，也無關宏旨。

第二，竹添光鴻的中國之旅在明治九年，岡鹿門的旅行則在明治十七年。在這八年間，中國與日本的情勢都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此或許是二者產生差異的最重要的原因。幕末維新的動亂情勢止息，成立安定的近代化政府，是在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戰爭停止以後。換句話說，國家統一，建立了近代化國家體制，日本即顯示出亞洲國家中歐洲列強式的姿態，開始倣效歐美列強的侵略行為，耽視朝鮮和中國。由於明治政府儼然有亞洲中最先進國家的強勢態度，身為先進日本國國民的岡鹿門的中國觀，自然與憧憬中國歷史風土的竹添光鴻有極大的不同。在親聞中國知識人對日本的情勢一無所知，又看到清朝對法國侵略中土而束手無策的情況時，對中國即採取嚴肅的批判。岡鹿門在《觀光記游》的〈例言〉中率直地指出：

是書間記中土失政弊俗，人或議其過甚。余異域人，直記所耳目，非有意為

^③ 關於「古典講習科」的詳情，參閱町田三郎先生的〈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の人々〉，《九州大學哲學年報》，第51期。

誹謗。他日流入中土，安知不有心者，或取爲藥石之語乎。

一般人以爲日本對中國觀的轉變，是始於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戰爭。其實，部分的知識人在明治十七、八年時，即有日本是先進國的傾向。岡鹿門的《觀光記游》或許正顯示此一傾向的端緒。^④

五、《漢文大系》與《漢籍國字解全書》

由服部宇之吉編集的《漢文大系》，刊行於明治四十一年（1909）到大正五年（1916）的八年間。共二十二卷，收載三十八種書籍，由富山房出版。全書按四部分類的話，可分爲：

經部——易經、書經、詩經、春秋左氏傳、禮記、四書、弟子職、小學。

史部——戰國策、史記（列傳）、十八史略。

子部——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管子、荀子、淮南子、七書、孔子家語、近思錄、傳習錄。

集部——楚辭、唐詩選、三體詩、古文真寶、文章規範、古詩賞析。

服部宇之吉編集《漢文大系》的目的有二：一爲系統的介紹具有代表性而且是常識性的中國古典及其精審的注釋；二爲蒐集日本幕末到明治時代儒學者的研究成果。至於《漢文大系》所顯示的意義，則在於吸收中國最新的學術研究，評價日本幕末以來的漢學研究成果。因爲《漢文大系》所收集的中國古典注釋不但有唐宋及其以前的注釋，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人注釋的收集，如孫詒讓的《墨子閒詁》、王先謙的《荀子集解》。至於本國前人的注釋，特別是諸子的注疏，更是大量的收錄。如安井息軒的《四書注》、《管子纂詁》，太田全齋的《韓非子注》等。因此，《漢文大系》的編集固然可以代表日本近代學術研究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隨著日本近代化國家確立的時代背景，在學術研究上，日本也有足以與中國最新學問，即清朝學術比肩的研究成果，特別是諸子研究，日本的研究未必遜於清朝。這或許是服部宇之吉編

^④ 關於二遊記的論說，參閱町田三郎先生的〈《棧雲峽雨日記》與《觀光記游》〉，《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

集《漢文大系》的用心所在。^⑤

《漢籍國字解全書》於明治四十二年（1910）到大正六年（1911）的八年間，由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分四次出版。收集了江戶時代的國字解，即所謂「先哲遺著」和新的注解而成。特別是以代表日本漢學之頂點的元祿（1688-1704）至享保（1716-1736）年間的先哲論述為主。

第一輯——四書、易經、詩經、書經、小學、近思錄、老子、莊子、列子、孫子、唐詩選、古文真寶。

第二輯——春秋左氏傳、傳習錄、楚辭、管子、墨子、荀子、韓非子。

第三輯——禮記、莊子、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四輯——文章規範、續文章規範、十八史略、戰國策、國語、淮南子、蒙求。

所謂漢籍國字解，是中國古典的國字化，即融合漢學與國學，形成日本文化的重要關鍵。換句話說是漢學的日本化。因此，《漢籍國字解全書》雖然和《漢文大系》同樣是整理漢籍，但是《漢籍國字解全書》的主要目的在保存日本文化的遺產與發揚近代日本學術研究的成果，不止是可以作為江戶時代到明治大正時期漢學史的參考資料，更是探究日本近代學術文化的重要依據。^⑥再者，《漢文大系》的編集有兼收中國與日本於漢學研究成果，進而顯示日本漢學特色的用心。《漢籍國字解全書》則全盤顯示漢學日本化的色彩，換句話說日本本土文化意識的顯揚是《漢籍國字解全書》的編集目的。

六、結語

於幕末維新之際，面對西洋文明的衝擊，鹽谷宕陰在所著的《六藝論》中，提出以東洋的傳統文化與制度，維護東洋秩序，匡救時政的論著。安井息軒的《辨妄》則以老儒生的執著與對東洋文化的信念，來對抗西洋文明。換句話說，幕末維新的文化攘夷論是針對西洋文明而發的。但是，對西洋文化的攘夷論，在全面文明開化的時代潮流中，終成為歷史的絕響。

^⑤ 關於《漢文大系》的論說，參閱町田三郎先生的〈《漢文大系》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文化史研究》，第34期。

^⑥ 關於《漢籍國字解》的論說，參閱町田三郎先生的〈《漢籍國字解全書》〉，《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9號。

明治十年以後，日本躍昇為亞洲的先進國，知識階層對中國的觀點也有顯著的轉變。岡鹿門的《觀光記游》即是一個證明。而中國觀的轉變，也帶動本土文化意識的高昂。《漢文大系》與《漢籍國字解全書》的編集，即是漢學日本化的產物。換句話說，明治十年以後的文化攘夷論是針對中國學術而發的。從明治以後的漢學研究一方面繼承江戶時代的儒學研究成果，一方面吸收西洋學術研究方法，而開創了近代日本學術文化的局面。今日日本的東洋學，特別是宋明學、佛教研究、東洋史學的研究成果，正是日本學界誇耀的所在。

日本幕末以來文化攘夷論略年表

1854年	日美和親條約簽訂
1858年	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簽訂
1858年	鹽谷宕陰著作《六藝論》
1860年	攘夷論的提出
1866年	安井息軒請中國學者為所作《管子纂詁》撰序
1873年	安井息軒著作《辨妄》——與西洋文明對抗
1876年	竹添光鴻遊中國，著作《棧雲峽雨日記》
1877年	西南戰爭結束
1882年	「古典講習科」設置
1884年	岡鹿門遊中國，著作《觀光記游》——中國本土學問的反省
1896年	聖諭記
1889年	岡本監輔著作《岡本子》——與西洋文明對抗的絕響
1894年	安井小太郎著作《本邦漢學史》——重視日本本土學問的提倡
1900年	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刊行
1902年	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學派之哲學》刊行
1905年	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刊行
1907年	服部宇之吉編集《漢文大系》
1909年	早稻田大學編集《漢籍國字解全書》